

## 第二次生态文学批评浪潮中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sup>〔\*〕</sup>

——以托妮·莫里森小说《宠儿》为例

○ 李 静

(安徽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次浪潮取得重大进展表现在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纳入其学术思考范围, 研究的重点放在长期被忽视的女性作家尤其是有色人种的女性作家作品解读上, 深入地讨论种族、性别、阶级、民族、历史等早期生态文学批评没有涉及的体裁和主题,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探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考察了女性和自然、以及她们对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欺压的抗争, 力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价值的观念。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探讨了自然与黑人之间、女性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破裂和重建, 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她以黑人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女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和谐美的追求。对莫里森作品进行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研究莫里森在面对自然疏离、性别歧视、种族压迫、身份重构等多重问题时的思考和探索, 丰富了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第二次浪潮;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宠儿》; 黑人女性与自然

### 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始于美国的生态文学批评 (Ecocriticism) 是在全球环境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产生的, 它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费尔蒂指出, “生态文学批评是把以地球为中心的思想意识运用到文学研究中, 探讨文学与自然的关系”。<sup>〔1〕</sup>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日趋恶化, 许多作家把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

作者简介: 李静, 安徽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主要从事生态文学批评、英汉语言对比研究。

〔\*〕本文系安徽省社厅 2013 留学人员科技活动基金项目。

和传播生态意识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美国生态文学日益繁荣。生态文学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仅表现人的生存环境和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还探索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sup>[2]</sup>迄今为止,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次发展演变的浪潮。第一浪潮主要研究如何在文学作品中发掘自然,而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思维融会贯通地看待自然,新的生态思潮应运而生。第二次浪潮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生态文学批评由早期探求“文学中的自然”转向对种族、阶级、性别等多种社会文化元素的探索。对作家的研究也由从英美白人男性作家为主转向研究多文化多民族背景的作家为主,黑人女性作家、少数民族裔作家有关自然文学的作品也被纳入其研究范围。<sup>[3]</sup>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涉及文学、伦理学、生态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研究的主体也来自不同的领域。地球上所有民族的生态智慧,如印第安人的丛林法则、印度的佛教、日本的禅宗、中国的“天人合一”的观念等都被批评家们吸收,拓宽了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视野。<sup>[4]</sup>生态女性主义将生态学与女性主义结合在一起,批判霸权文化价值观导致剥削统治的社会体系。这一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它主张改变人类统治自然的思想,提倡与自然构建和谐关系,为生态批评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sup>[5]</sup>

托妮·莫里森是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她的小说自出版以来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重视。但国内外对她的小说研究主要集中在审美标准、种族主义、叙事结构等方面,随着生态危机的突显,她作品里体现的生态问题逐渐引起文学评论界的关注。本文运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探讨她在小说《宠儿》中种族、性别、阶级、社会与自然的复杂交互的关系,阐释了白人主导的霸权文化如何使奴隶制合法化,导致黑人与自然和谐友好关系的破裂,进而从生态角度挖掘造成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得出小说中暗含的生态女性主义诉求:重新构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获取身份认同,恢复非洲的历史文化。

## 二、生态文学批评与自然的重新构建

### (一)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解析

法国女性主义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女性主义抑或死亡》(1974)一文中,最先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标志着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开端。奥波妮把生态理论和女权理论结合在一起,指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直接的联系,号召在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sup>[6]</sup>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试图在认识层面上阐明各种压迫制度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致力于根除二元思维方式和价值等级制度观念,在关联主义、整体论和多元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理论框架。生态女性主义突破了人际伦理的局限将伦理的追问延伸到人与自然的整个生态系统中,一方面承认非人类存在物拥有与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反对道德优越论;另一方面声援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反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sup>[7]</sup>生态女性主义对同时代的文学活

动产生了冲击作用,学术界崛起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分析。著名生态批评学者墨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需要一种批评理论把生态女性主义的各方面联系起来,使其形成指导实践的批评——成为一种元哲学而非垄断式的政治教条或者抽象的解释工具。”<sup>[8]</sup>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研究领域确立了自身的存在,批评家们开始把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各种观点视作文学批评的一部分。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是生态批评的衍生物,把自然作为批评的维度是它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根本区别。女性与自然,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议题的文学批评都不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与自然的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联盟通过文化、语言而顽固地持续下来,妇女与自然在现实中的遭遇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内容涉及对文学中将女性自然化或将自然女性化描述的梳理和分析;对女作家生态写作进行理论概括;整理与归纳女性文学家在文学作品或理论中表露的自然观等等。它的文本包括文学文本、艺术文本、政治文本等,在主题上都是同时再现或表现了自然与女性的活动、处境、命运等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视点涉及一切受压迫和受控制的群体,但始终有两个焦点:女性与自然,它与女性主义批评一样,既关注“女性文学”,又解析“文学女性”。<sup>[9]</sup>

## (二)托妮·莫里森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观点

1987年,托妮·莫里森发表了不朽杰作《宠儿》。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9世纪50年代,一个从肯塔基奴隶庄园逃跑的女黑奴玛格丽特·加纳在逃往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路程中,遭到奴隶主疯狂追捕,为了避免儿女重复自己做奴隶的悲惨命运,她毅然抄起一把斧子,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莫里森为这个故事深深震撼,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她极想通过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来探究当事人的心理,为罪恶的奴隶制下深受精神和肉体残害的黑奴们写一部心灵控诉史。历经长达十年的酝酿和三年的写作,以此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宠儿》终于问世。这部作品发表后在美国文学界、文化界引起强烈震动,各大报刊纷纷刊文给予最高规格的赞语,认为它是美国黑人历史的一座纪念碑。出版第二年即荣获普利策奖,随后跻身现代文学经典作品之列。《宠儿》探讨了美国黑人历史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如何将黑人和自然结合成“他者”阶层,以确保奴隶制度的合法化,并否定黑奴的国家公民身份,同时又割裂黑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被深度政治化等议题。在小说创作中托妮·莫里森表现出非凡的批评和书写能力,她的语言、人物性格塑造、还有她精湛的意识流写作技巧把“种族”、“社会”、“自然”等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元素表现得淋漓尽致。托妮·莫里森的黑人女作家身份使她能够更加全面彻底地了解黑人女性的生存现状,对她们所受到的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压迫进行深层次挖掘,阐释了生存在男权主义、种族主义夹缝中的美国黑人女性独特的自我意识。<sup>[10]</sup>作为一位学者型作家,她的小说含有自然这一重要因素,莫里森在探求黑人女性出路的过程中意识到自然、女性、黑人遭受统治和压迫的根源是相同的,小说中的女性角色

无一例外充满了女性主义的抗争,她在力图消灭性别歧视的同时也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价值体系。<sup>[11]</sup>

托妮·莫里森在其作品中阐述了奴隶制度如何割裂黑人和自然的亲密关系。黑人自古以来都与自然息息相关,而这种天然的关系却遭到美国白人所建立的奴隶制的破坏。但是白人的霸权文化意识对自然的构建有着天然的疏漏和不合理性,因此这种割裂不是绝对的,这就给受压迫、失去身份认同的黑人以反抗的机会。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黑人以此为工具奋起抗争,最终修复了与自然的关系。很多白人作家将自然描绘成远离社会问题的纯美地带,而托妮·莫里森则认为,“对自然的感知不是简单的对外部绿色世界的本能反应,而是潜在的种族政治的反应”。<sup>[12]</sup>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将自然和黑人统一起来视为与他们阶层不同的、荒蛮的“他者”,需要驯化、开发和利用。白人的这种霸权意识合法化了奴隶制,剥夺了黑人成为美国合法公民的可能性,导致黑人和自然的天然关联受到损害,自然作为构成生态环境的本质属性被过度地政治化。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首先挑战了白人文化对自然的定义和构建,同时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可以转化为黑人用以反抗和修复黑人社区的有力工具。

### (三) 奴隶制度下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

自然一直在黑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他们沦为奴隶的时代都扮演过积极的角色:林间狩猎,河里捕鱼,原野耕种,这些与自然的天然亲近活动使他们与其赖以生存的家园——大自然建立了息息相关的深厚感情。园艺更是对黑人女性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她们不仅依靠园艺维持生计,充分享受自然给予的丰厚资源,园艺也是滋养她们精神的乐土,她们在园林里唱歌、祈祷、相聚在一起讲民间故事,传承着非洲的传统文化。自然更深的意义还在于,广袤的森林荒野还是黑人奴隶不堪被欺凌奴役而逃亡时的藏身之地。

然而,莫里森笔下的自然不仅是黑人快乐和希望的源泉,还是白人压迫黑人的工具。黑人与自然的感情又是复杂、矛盾的,他们对自然的依恋之情中还夹杂着深深的恐惧和疏远。自然的本质属性中也充满了危险的因素:恶劣的天气,凶猛的野兽,幽深的密林,湍急的河流,潮湿的沼泽等都给他们的生活劳作带来危险,甚至随时吞噬他们的生命。此外,荒野密林既是黑奴逃亡藏身的地方,但更多的是受奴隶主欺压凌辱的场所。他们在逃亡中忍受着随时被抓的精神压力,一旦被抓就面临着残酷地鞭打,挂在树上绞死,或浑身涂满柏油沾上羽毛烧死,或推到河里淹死等悲惨结局,自然沦为上演活生生血腥暴力的舞台。<sup>[13]</sup>

黑人女性更是受到最沉重压迫的代表,她们在奴隶制历史阶段所遭受的悲惨经历是不堪回首的,唤醒这段黑人种族的布满创伤的记忆正是托妮·莫里森艺术创造的基本文化立场。对于黑人女性来说,她们要比黑人男性遭受更大的欺凌和侮辱:随时都可能被拖到林中受庄园主恣意强暴,反抗只会带来更大的折磨甚至杀害。尤为痛苦的是,她们还会亲眼目睹这些暴力和欺压延续到他们的

孩子身上,做奴隶的非人遭遇似乎成为无法逃脱的宿命。在《宠儿》中,莫里森用她独特的视角讲述了黑人妇女真实的处境,使人们可以强烈感受到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女性的痛苦经历和艰难的心路历程:女奴塞丝无意间撞见“学校教师”指导两个侄子对黑奴进行研究,还要求他们在纸上把塞丝“人的属性放在左边”,“动物的属性放在右边”,<sup>[14]</sup>这给她的精神以强烈的冲击;当塞丝怀孕六个月的时候,因为汇报了“学校教师”儿子的行为而遭到他两个侄子的毒打,她的后背被划开,伤势严重留下永久的伤痕。<sup>[15]</sup>黑人女性没有权利可言,自然沦为白人奴隶主实施暴力也是隐藏暴力的天然场所。<sup>[16]</sup>正如生态批评家布罗姆所说的:“荒野不仅为奴隶提供藏身之所,黑人文化保护得益于自然,但是自然也隐藏了施加在黑人妇女身上的暴力”。<sup>[17]</sup>在《宠儿》中,树、植物和自然是对于黑人女性的抚慰与精神支撑,又是与暴力和残忍相关的媒介。塞丝的后背由于被鞭笞留下一个像树一样枝杈蔓延的疤痕,“我后背上有一棵树,家里有个鬼,除了我怀里抱着的女儿我什么都没有了”<sup>[18]</sup>塞丝回忆说。她常常忆起“甜蜜之家”梧桐树的美丽宽大的叶子,而伴随着这些叶子的却是枝条上悬挂着的黑奴的尸体;透过梧桐树叶她还常常看到庄园主用梧桐树的枝条鞭打她的孩子,美丽和丑恶交织在一起同时进入脑海。对自然美的向往和回忆让塞丝感到羞耻和自责,她的精神世界被分裂成对自然美的吸引和她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暴力的痛苦折磨,奴隶制给塞丝的人生带来刻骨铭心的恐惧与阴影的同时也割裂了她与自然的本质关联。

黑人对自然的复杂情感在托妮·莫里森的《宠儿》中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逃到俄亥俄州的塞丝和保罗 D 对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南方种植园“甜蜜之家”的回忆中交织着对美丽自然风光的钦慕依恋以及对施加在他们身上暴力的丑恶场景的厌恶和痛恨。保罗 D 对树的依恋反映了他深爱自然又被迫与之疏远的情感,“……午饭后,从田野里劳作回来,那些树在召唤着他,看起来是那么值得信任,你可以对他说你想说的任何事情”。<sup>[19]</sup>保罗 D 对自然有着发自内心的喜爱,他称其中一棵树是自己的“兄弟”,并经常在树下歇息,那是一种可以躲开周围一切丑陋的安慰。在以后保罗 D 逃离“甜蜜之家”一路向北追求自由之地的逃亡过程中,一直伴随他的也是那些在荒野密林中的枝繁叶茂的树。然而,正是从这些丛林中,让他感到随时威胁着他的某种危险的东西,这使他在情感上不得不对所钟爱的自然保持心灵的疏远。在经历逃亡过程中各种暴行之后,保罗 D 明白,那些他触手可及的自然景物、那些他赖以生存的原野土地都不属于他,他无法去爱他内心深爱着的自然。他对塞丝说:“如果你不去爱你想爱的东西,当它失去的时候,你就不会受到伤害”。<sup>[20]</sup>如果说塞丝对自然的情感回忆充满了矛盾愧疚,而保罗 D 却挣扎在想去热爱大自然却要首先保护自己生命的纠结困惑之中。

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其根源在于基于白人文化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建立起的奴隶制。奴隶制度使得黑人原本和自然的亲密关系变得破碎不堪。

南方的种植园本是黑奴的家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劳作,然而黑奴的经历又使他们对那片广袤的旷野充满了种族仇恨。生活在所谓“幸福之家”奴隶庄园的男子汉们,其真实的处境就是一群沦为奴隶的黑鬼,被看成“人种中的渣滓、没有角的公牛、阉割的辕马、没有牙的看门狗。”<sup>[21]</sup>黑奴保罗 D 的经历更是充满了动物般的退化:“他被迫在嘴里戴着一个马嚼子,当嘴唇被往后拽的一刹那,野蛮和疯狂瞬间爆入眼睛;舌头被压下来:你叫的越狠,越忍不住想把它吐出来”。<sup>[22]</sup>在莫里森看来,这种兽行的随意性所包含的对人类生命和尊严的蔑视比奴隶制本身的残酷更令人胆寒心惊。

奴隶制度使黑人对自然充满了爱恨交加、既想亲近又想躲避的复杂矛盾的情感。然而,这种破损的关系却为白人文化所利用,白人的统治地位从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中建立起来,他们通过否定黑人对自由、财产主权以及拒绝认可非洲的历史文化,达到维系否认黑人公民身份的社会制度的目的。<sup>[23]</sup>白人占有了土地,宣称对自然的权利,也就拥有了自由和公民权。黑人与自然关系的破裂使得黑人无法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也就失去了公民的身份,只能沦为被欺压的奴隶。蕾切尔·斯坦恩说,“白色人种的霸权使得黑人失去自然家园的关系,失去自己的历史和自主权,成为劳作在土地上的奴隶”。<sup>[24]</sup>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人霸权文化一方面宣称对自然的占有,将黑人与自然割裂开,同时又将黑人和自然结合在一起,将他们共同贬低为可以任意欺压、占有、利用的“他者”阶层。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托妮·莫里森给出了意义深刻的解释:“定义属于定义者,而不属于被定义者。”<sup>[25]</sup>白人文化保留着下定义的权利,自然通过被占有成为白人的地盘,为了保持占领的特权,自然必须被视为“他者”。白人霸权意识将黑奴和自然结合在一起,共同视为被征服的“他者”,统治阶层就可以达到对他们下定义和控制的目的。白色文化对自然的占有被纳入确立身份认同的部分因素,就决不允许黑色文化与自然建立联系,他们只能被镶嵌在自然之内,成为白人奴役的对象。史密斯说:“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界定了自然,界定了它的生理特征,是占有和被占有的形式”。<sup>[26]</sup>罗伯特·纳什注意到,“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当中,黑奴和自然一样,被看成未开化的、低于人类的有着野蛮属性的动物;开拓者被视为道德英雄,将荒蛮文明化是对开拓者的回报,成为向人炫耀的资本。”<sup>[27]</sup>白人视黑人和自然为文明世界的威胁和对立面,进行驯化和控制,以强化白人对自然和黑奴的占有,目的是建立起白人文化为主导的霸权社会体系。

#### (四)重建黑人与自然和谐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提出人类走出种族、性别藩篱,走向与自然和谐的构想。<sup>[28]</sup>在《宠儿》中,托妮·莫里森不仅叙述了奴隶制如何影响黑人对自然的看法,还阐述了黑人反抗欺压的可能性:通过收回对自然的所有权,挑战白人的定义,重建他们的历史文化。在《宠儿》中,莫里森展现了黑人女性代表贝比·萨格斯、塞丝等人如何在自然中获取力量,抵制主流文化的霸权和种族内部的性别和阶级压迫,通过身份的寻求达到重构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目的。

黑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损害但是并没有遭到完全破坏,修复关系胆寒心惊、治愈伤痛的可能恰恰就存在于这种破裂的关系中。在《宠儿》中,我们看到诸多自然与暴力联系的场景,但也看到黑人和自然重新构建和谐关系的希望。虽然黑人女性饱受歧视摧残,但是并没有失去信念,她们一直努力地追寻自我身份认同。当女奴塞丝被带离谋杀现场时,“她上了马车,头高高地昂起,背挺得笔直,她的侧影刀锋般清晰地映在碧蓝的天空里。”<sup>[29]</sup>塞丝清楚地显示出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黑人女性从来没有对外界屈服过,当保罗 D 得知塞丝杀女真相后指责她“太危险了,一个做过奴隶的女人……你的爱太浓了”,她的答复是:“要么是爱,要么不是,平平淡淡的爱根本不是爱”。<sup>[30]</sup>一个似乎失去理智的弱女子身上发出的声音,宣告了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走向自觉的开始。格里芬指出:“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为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sup>[31]</sup>《宠儿》中的“林场空地”是黑人生命力量的源泉和心灵的寄托,社区的黑人女性贝比·萨格斯利用这块土地,通过布道传递着争取身份认同的希望。萨格斯自身是奴隶制的牺牲品,在她心中的自我形象不过是一个混到六十岁,走起路来像三条腿的狗的黑奴。”<sup>[32]</sup>然而就在她踏上自由土地的那一刻,突然听见了“自己的心跳”,“这双手属于我,这是我的手。”<sup>[33]</sup>这狂喜的呐喊,正表达了贝比心中向往自由的强烈情感。黑人都有天生为自己的黑皮肤而自卑的心理,他们认为就是因为身上的黑皮肤,才使他们从出生开始一辈子饱受白人的摧残,所以对自己的身体格外厌恶。贝比·萨格斯比她的黑人同胞有着更清醒的认识,她号召黑人同胞要热爱自己的肉体,“比眼睛比脚更热爱……比呼吸自由空气的肺更热爱。”<sup>[34]</sup>在她的号召下,黑人们聚集在这里祈祷、歌唱、欢呼,大自然中的宣泄滋养了黑人的心灵并增添了他们生活下去的勇气和重建黑人社区的信心。

托妮·莫里森笔下的“林间空地”不仅挑战了白人对自然的构建,也动摇白人通过奴隶制合法化建立起的公民身份,使黑人修复与自然的关系、恢复身份成为可能。<sup>[35]</sup>尽管白人文化将自然构建成固定不变的意象,但是这种构建是建立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这就使得自然一方面被认为是可压迫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可用作反抗压迫的工具。林间空地就是利用了自然意象的双面性使黑人女性在自然中寻求慰藉,走向自我成长和自我认同的第一步。白人通过对自然的定义建立自己的社会制度,黑人同样可以通过恢复与自然的关系建立自己的文化。林间空地中建立起来的反映黑人文化和宗教以及对自然的强大精神联系,瓦解了横亘在身体、自然、文化之间的界限,为黑人女性和自然建立积极和谐关系提供契机。<sup>[36]</sup>《宠儿》中表现出最强大的力量在于对白人所定义的自然公然挑战。托妮·莫里森颠覆白人对自然的界定,成功地刻画了种族、性别、自然、身份和历史之间非固定的流动联系,如前面所讨论的,塞丝对“甜蜜之家”的回忆既依恋又恐惧,这似乎很难将“甜蜜之家”定义为“好”或“坏”的地方,托妮·莫里森模糊了事物的界限,自然在情感中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意象,在《宠儿》中它是

一个充满忧伤恐惧又是一个治愈精神伤痛的场所。白人依赖对自然的占有而使价值观和身份认同合法化,而人与自然关系的流动性使我们意识到黑人女性可以通过修复与自然的关系,动摇自然和身份的认同标准,从而挑战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观。托妮·莫里森通过持续展现文化感知对自然世界冲突,解构了“自然整体观”的概念。她强调“任何对自然的感知都不是对这个世界固定不变的看法,而是文化参与调停的结果。”<sup>[37]</sup> 尽管白人文化宣称对自然的占有和统治,并将其镌刻到社会和文化规则当中,但是像“林间空地”这样的文学构建却提供了一个包含着与同一个自然相关的、不同的历史和价值的反叙述模式,从而颠覆了白人的绝对的统治和其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关于自然的非固定性,生态女性作家卡特里·奥纳曾论述:“……自然总是反抗它自身的构建,自然对“他者”、对话语中的认知来说,无论多么民主,都不是彻底的。”<sup>[38]</sup> 这诠释了《宠儿》中的为自然归类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为“他者”创造了可以挑战和抗争那些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的空间。托妮·莫里森提醒我们,早在奴隶制之前,黑人女性就建立了自己的历史文化,重新和这些传统结合可以修复与自然断裂的关系,她强调黑人女性一定要书写与自然建立的积极关系的新历史,这样才可以治愈奴隶制所造成的精神和肉体伤痛,恢复传统文化。

### 三、结 语

用生态的眼光看文学,必然要重新审视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充分重视自然对于文学的本源性意义。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探讨了自然与黑人之间、女性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破裂和重建,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她以黑人女性作家独特的视角表达了女性对女性和自然和谐美的追求,尤其是黑人女性解放自己、重构身份认同,与传统文化历史相结合的强烈愿望。从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角度探讨莫里森在面对自然疏离、性别歧视、种族压迫、身份重构等多重问题时的思考和探索,拓宽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野,丰富了对莫里森创作的研究。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次浪潮打破了第一次浪潮中构建的自然整体观,将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纳入其学术思考范围,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更为深刻的探讨。生态女性文学批评考察了女性受到的欺压和凌辱,以及她们的奋起抗争等等,把生态文学批评置于自然、女性、社会这个人类生态系统中进行全面探讨,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力求建构一种既展示文学批评本色又体现综合生态精神和生态价值的观念,为文学批评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 注释:

[1]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 18.

[2] Rueckert William, *Literature and Ecology: 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 Iowa Review 9.1 Winter



1987: p. 71.

[3] Adamson, Joni and Scott Slovic, *The Shoulders We Stand On: An Introduction to Ethnicity and Ecocriticism*, MELUS 34.2, Summer 2009: p. 5.

[4] Biehl Janet, *Finding Our Way: Rethinking Ecofeminist Politics*,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 1991: p. 24.

[5] Patrick D. Murphy, *Literature, Nature, &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32.

[6] Josephine Donovan,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Reading the Orang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 p. 77.

[7] 金莉:《生态女权主义》,《外国文学》2004年第5期。

[8] Patrick D. Murphy, *Literature, Nature, & Other: Ecofeminist Critique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5: p. 19.

[9] 关春玲:《西方生态女权主义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0] 白丽敏:《托妮·莫里森与生态女性主义》,《作家杂志》2011年第3期。

[11] Birkeland, Janis, *Ecofeminism: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Greta Gaard,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3: p. 13.

[12] Armbruster, Karla and Wallace Kathleen R.,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Wilderness Where There Was None, In Beyond Nature Writing: Expanding the Boundaries of Ecocriticism*, ed. Karla Armbruster and Kathleen R. Wallace.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1: pp. 211 - 233.

[13] Angelo, Bonnie, *The Pain of Being Black*, Time, 22 May 1989: pp. 120 - 121.

[14][15][18][19][20][21][22][29][30][32][33][34][美]托妮·莫里森:《宠儿》,潘岳、雷格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6、86、75、96、204、307、310、146、205、258、304、346页。

[16] Toni Morrison, *Belov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5.

[17] Bloom, Harold, *Toni Morrison's Beloved*, Broomall, PA: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4: P. 108.

[23] Bell, Bernard W. *Beloved; Womanist Neo - Slave Narrative; or Multi - vocal Remembrances of Things Past*.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26. 1, 1992: pp. 7 - 15.

[24] Krumholz, Linda, *The Ghost of Slavery: Historical Recovery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26. 3, 1992: pp. 395 - 408.

[25] Andrews, William L. and McKay, Nellie Y. eds.,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 Case Boo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23.

[26] Smith, Kimberly. *African American Environmental Thought*, Lawrence: UP of Kansas, 2007: p. 200.

[27] Nash, Roderick,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New Haven: Yale UP, 1967: pp. 24 - 25.

[28] 韦清琦:《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枝奇葩》,《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4期。

[31] Gruen, Lori, *Valuing Nature" in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ed. Karen Warren and Nisvan Erkal, Nashvill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356 - 373.

[35]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Santa Cruz: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p. 226.

[36] Warren, Karen J. and Erkal, Nisvan, eds. *Ecofeminism: Women, Culture, N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25 - 436.

[37] Birkeland, Janis, *Ecofeminism: Linking Theory and Practice*, Ecofeminism: women, Animals, Nature, Greta Gaard, ed.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93: pp. 13 - 59.

[38] Sandilands, Catriona, *The Good - Natured Feminist: Ecofeminism and the Quest for Democrac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p. 203 - 204.

[责任编辑:黎虹]